

郭沫若治古史的現實意涵

◎ 潘光哲

遊子心路歷程的轉向

1928年3月24日，郭沫若以南昌大學教授吳誠的化名，在上海匯山碼頭登上往日本的輪船，開始了十年的流亡生活。

異軍突起於「五四」時代的郭沫若，既歷經了時代的變動：參加了北伐，和中共站在同一戰線上，還寫了〈請看今日之蔣介石〉這一篇討蔣檄文，把蔣視為「是流氓地痞、土豪劣紳、貪官污吏、賣國軍閥，所有一切反動派——反革命勢力的中心力量」；也歷經着思想上的轉折：從持泛神論世界觀的詩人，轉向為馬克思主義者；但是，他在流亡日本之後，已是遠航的遊子，已經無法直接加入武器批判的陣營裏去了，拿起筆來當成批判武器在文化戰場上開火，成為他此後的工作重心。

然則，作為詩人而崛起的他，並沒有繼續深入向文藝領域進軍，反倒開始向研究中國古代社會歷史和文獻

方面發展。這樣的轉折是很費人疑猜的，也引起史家探究的興趣。

余英時先生曾發表〈莫道人間總不知——談郭沫若的古史研究〉一文，對此頗有分析^①。余先生指出，郭沫若轉治古史的其中一個動機是要打倒胡適。而早於余先生提出此論點者，猶有逢耀東先生^②。二位史界前輩之論皆言之有故，頗發人深思，較諸中國大陸的研究者，動輒祭出作為馬克思主義者郭沫若的大旗，為此一轉折妄做溢美吹捧之論，其間相去不可以道里計。

然而，從郭沫若個人的立身處世來分析他轉向古史研究的歷程，固是頗有所見，於知人論世之道自能有所啟發。惟則，在道德範疇中臧否月旦，揭示個人愛憎好惡的影響是一回事；而論斷史勢之變化源由，並及於透過此一論斷序階，來深化吾人之歷史認識，則是另一回事。

即令我們知道從詩人轉向古史研究者的郭沫若，在此期間經歷過這樣

那樣的心路歷程，但是這般的歷程，難道只是由個人的權位慾望甚或好勝心理，而產生了轉換畢生志業所繫的刺激嗎？一心一意想要出人頭地的郭沫若，在詩壇的地位不早就得到了肯定嗎？試觀朱自清在《中國新文學大系·詩集》的〈導言〉中對郭沫若的稱譽，我們不難想像，他是有在這方面繼續一展長才的本錢的。事實上，郭沫若的確也曾以馬克思主義之觀點，大談革命文學理論，甚而倡言當「馬克思恩格斯的留聲機」，以為只有充當一部留聲機器，才可能走上革命文學的道路。儘管他的理論不免有些左傾幼稚病的習氣：其相較於魯迅、茅盾等人之仍然在文藝領域著書立說，依舊獲得相當高的評價：甚至胡秋原推出《唯物史觀藝術論》，也帶來一時風潮，郭沫若之轉向，得付出的成本未免太大了些：萬一他在古史研究領域內搞不出甚麼名堂來，反倒喪失了他原有的詩壇霸主與左派文藝理論家的地位，善於估量形勢的他，還會走上這條路嗎？

那麼，郭沫若《中國古代社會研究》一書的誕生，難道就只能視為他意欲取胡適而代之所完成的論著嗎？我們是否該從它問世之際的社會背景與其象徵的社會意義來理解它／他呢？更何況，由這部著作連帶產生的社會作用，已為時代之趨向指出了一條新路。我們不能想像，因着郭沫若《中國古代社會研究》一書而引爆的「中國社會史論戰」這場意涵深刻的思想鬥爭，是單憑郭沫若個人一心與胡適爭短長而動搖筆桿之後就能帶來的。畢竟，在這場論戰的參與者心目中，胡適曾振臂高呼的，重新估量一切價值進而改造文明的主張，恐怕只是與怒濤澎湃的革命時代全不相干的

書生之見。時代的風向，與它所起的推波助瀾作用，以及此後的影響所在，才是我們應該關懷的重心。

為甚麼要應用馬克思？

依郭沫若自己的回憶，他就如同魯迅要回應創造社等後起之秀的攻擊砲火，而開始研讀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著作一般，他走向古史研究的轉折，也是出於外在環境之影響的。

他回憶道^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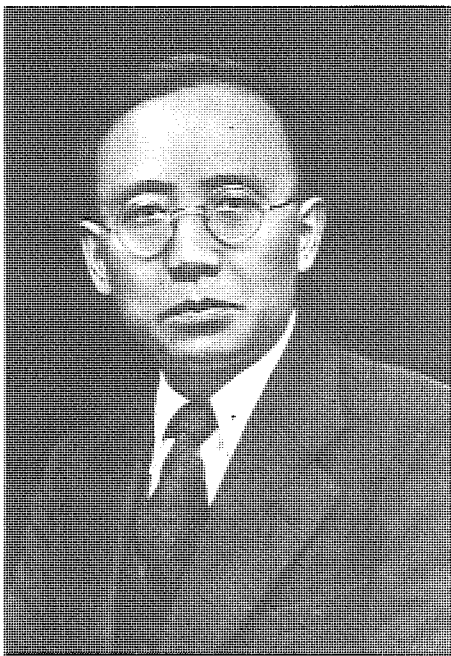
辯證唯物論的闡發與高揚，使它成為了中國思想界的主流，後期創造社幾位朋友的努力，是有不能抹煞的業績存在的……我的向中國古代文獻和歷史方面的發展，一多半也就是被這幾位朋友「擠」出來的。

他宣稱：

辯證唯物論是人類的思惟對於自然觀察上所獲得的最高的成就……但只是作為純粹的方法來介紹，而且生硬地玩弄着一些不容易消化的譯名和語法，反而會在這個方法的接受和運用上增加阻礙……要使這種新思想真正地得到廣泛的接受，必須熟練地善於使用這種方法，而使它中國化。使得一般的、尤其有成見的中國人，要感覺這並不外來的異物，而是泛應曲當的真理，在中國的傳統思想中已經有着它的根蒂，中國歷史的發展也正是循着那樣的規律而來。因而我的工作便主要地傾向到歷史唯物論這一部門來了。我主要是想運用辯證唯物論來研究中國思想的發展，中國社會的發展，自然也就是中國歷史的發展。反

郭沫若轉向古史研究得付出的成本未免太大了些：萬一他在古史研究領域內搞不出甚麼名堂來，反倒喪失了他原有的詩壇霸主與左派文藝理論家的地位，善於估量形勢的他，還會走上這條路嗎？

在社會史論戰中，郭沫若雖成了眾矢之的，但他卻成功地為往後的歷史研究劃定了新的軌迹。



過來說，我也正是想就中國的思想，中國的社會，中國的歷史，來考驗辯證唯物論的適應度。

在這兒，郭沫若未嘗透露出他與胡適間那一抹「可取彼而代之」的心結——雖然，在《中國古代社會研究》一書的〈自序〉裏，他着實嘲笑了胡適的《中國古代哲學史》對中國古代的實際情形未曾摸到一些邊際；但是我們應該注意的是，與郭沫若這段回憶內容相結合的外在環境：即北伐完成，中共的「第一次國內革命戰爭」失敗之後，在文化思想戰場上燃起的遍地烽火。

文化思想戰場上的烽火

先就郭沫若出身的文藝領域而言，既有左翼同自由派的爭辯，左翼內部也紛爭不斷。

前者是對梁實秋、徐志摩、胡適等為主的「新月派」——以《新月》為

陣營——的批判，創造社的成員和魯迅都不遺餘力；後者卻是以抨擊／擁護魯迅為基線的「革命（無產階級）文學」的論爭。儘管有共同的敵人，但是在一時之間，瞿秋白所謂的「文人的小集團主義」竟戰勝了「階級意識」。

本來，郭沫若是意欲同魯迅合作的：在1928年12月3日刊於上海《時事新報》之《創造週刊》復刊廣告上，魯迅即以該刊「特約撰述員」的名義領銜，郭沫若化名「麥克昂」居次，以下還有創造社老成員成仿吾、鄭伯奇等人。但是，因為成仿吾到了日本，和「氣銳非常，革命情緒火熱地高漲」的「少壯派」李初黎、彭康、朱鏡我等人訂了一個新計劃，「要把創造社作為明朗的思想戰的基地，要盡力從事於辯證唯物論和歷史唯物論的推闡工作」，而「對於和魯迅合作的事情，大家都很冷漠」。郭沫若只好退讓，合作之議未成；而且在此後，他並和其他創造同仁社一樣，朝魯迅開火。

文藝戰線上廝殺之聲不絕於耳，與現實關連甚密的思想戰場上更難例外。不分中外左右，成功失敗，各種政治立場的人士都在思索着適合當前實際需要的政見／策略。

政治現實的修羅場

已然建立政權的國民政府，為積極實現其政略方針，積極推動三民主義的宣傳，展開對中共的思想鬥爭。在這個立場上的陶希聖回憶說，當時他在思想上與中共幹部派展開鬥爭，功用到兩方面，一方面是用社會歷史方法解釋三民主義與國民革命，另一方面是用此方法研究中國歷史。受

到胡漢民《三民主義的連環性》的影響，他連續發表論文，鼓吹「三民主義的不可分性，實際仍不過是企圖以社會史觀解釋三民主義」。

但是，國民黨並不是鐵板一塊。

1928年冬末出現的「中國國民黨改組同志會」，即改組派，在爭奪黨內領導失敗後，同樣地思索着他們的路。在「反蔣」的號召下，改組派的理論即使沒有創見，但仍然吸引不少成員，在各地建立支部，並且以《革命評論》及《前進》為言論機關。如改組派大將陳公博的回憶，他們既反對中國現況仍是封建制度的論點，也反對土地革命的主張——這是針對中共而發的：但是對於南京國民黨中央黨部接受戴季陶的觀點，把孫中山抬起來，當做承繼堯舜禹湯文武周公道統的理論，也同表不滿。中共的理論家起而攻之，帶來的只是思想戰場上的硝煙：南京的國民黨中央，卻使盡了一切手法讓《革命評論》「不能印，不能寄，不能賣」，煙消雲散。

在共產黨方面，前此革命失敗的經驗總結，卻主要透過黨內鬥爭清算的形式表現出來。

在莫斯科，共產國際關於中國革命的爭論，充分地表現於斯大林同托洛茨基之間的衝突上。在1927年12月召開的蘇聯共產黨（布爾什維克）第十五次代表大會中，托洛茨基等「反對派」遭受正式開除黨籍的命運。而在此之前的9月27日，共產國際（第三國際）則早把托洛茨基等人趕出了國際執委會。由他們對中國革命的爭論內容來看，其議論分歧的源由，除了是對中國社會性質的認識不同，對於要採取甚麼樣的策略始能在這個社會中發動革命，見解也不同。

在中國，有關爭論則是在1927年

8月7日，中共中央在漢口舉行的緊急會議（「八七會議」）上開展的，首先出現的是對「陳獨秀右傾機會主義」路線的批判。而後，中共的第六次全國代表大會（六大），於1928年6月18日在莫斯科召開。大會的「政治決議案」，不但批評了陳獨秀的機會主義和瞿秋白的盲動主義，也規定了當時中國革命的動力，以及革命的基礎和中心任務，倡言驅逐帝國主義，完成中國真正的統一：並主張從事「徹底的平民式的推翻地主階級私有土地制度，實行土地革命」。

不過，部分中共成員對前此失敗經驗的反省，並非都是以共產國際的意見為依歸的。尤其是以一直執行共產國際指示、領導中共的前任總書記陳獨秀為然。這時候他已從前線退到書齋，由閱讀思考托洛茨基關於中國問題及一些蘇聯問題的文獻，開始轉變成為托洛茨基主義者。到了1931年5月，原有的四個中國托派組織，召開了統一大會，成立「中國共產黨左派反對派」（又稱「中國共產黨列寧主義者左翼反對派」），主張當前革命的策略，不應該從事武裝暴動及建立蘇維埃，而應參加各種合法活動及國民會議活動，故被中共稱為「托陳取消派」。

除了國民黨、共產黨兩大政治勢力（乃至其反對派）之外，尚別有他見。

例如，以鄧演達（中夏）為首的第三黨（中華革命黨，1928年春成立），就主張實行「平民革命」，建立「平民政權」，別樹一幟。

而自由主義者方面——主要是「新月派」——除了在文藝領域中點燃戰火之外，同時也對政治議題發言，既批評正在推動「訓政」的國民政

1928年冬末出現的「中國國民黨改組同志會」，對於南京國民黨中央黨部接受戴季陶的觀點，把孫中山抬起來，當做承繼堯舜禹湯文武周公道統的理論，表示不滿。

府，也反對用革命方法找尋出路。如胡適寫了〈我們走那條路〉一文，就指陳中國應該鏟除的五大仇敵：貧窮、疾病、愚昧、貪污和擾亂，即曾轟動一時的「五鬼鬧中華」論。

清算歷史的現實作用

與以上簡述的各種意見對比，郭沫若倡言運用辯證唯物論（即馬克思主義）研究中國思想、社會的發展，或就中國歷史、思想、社會的發展來考驗馬克思主義的適應度，並以《中國古代社會研究》一書為後繼者做了示範表演，實可視為另外一種表達政治意見的方式。

他在《中國古代社會研究》一書中，論證中國歷史的發展階段符合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原理，儼然即是一篇暗示中國必然走向社會主義／共產主義社會的政論文字。他說④：

對於未來社會的待望逼迫着我們不能生出清算過往社會的要求，……認清楚過往的來程也正好決定我們未來的去向。只要是一個人體，他的發展，無論是紅黃黑白，大抵相同。由人所組織成的社會也正是一樣。

中國中有一句口頭禪，說明「我們的國情不同」。這種民族的偏見差不多各個民族都有。

然而中國人不是神，也不是猴子，中國人所組成的社會不應該有甚麼不同。

因此，他強調⑤：

我們把中國實際的社會清算出來，把中國的文化，中國的思想，加以嚴密

的批判，讓你們看看中國的國情，中國的傳統，究竟是否兩樣！

郭沫若即藉着論證中國社會的發展符合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原理，由此歸結及於中國未來的景況亦必如是⑥：

社會是要由最後的階級無產者超克那資本家的階級，同時也就超克了階級的對立，超克了自己的階級而成為無階級的一個共同組織，這是明如觀火的事情，而且事實上已經在着着的實現了。

亦即，馬克思預言人類社會必將走向無產階級革命的歷程，中國自不會因「國情不同」而有所例外。郭沫若進行中國古史研究的現實意涵，不言可喻。

從當時人的回應，我們也可以看出郭沫若這部書的定位。

例如批評郭沫若甚力的李麥麥就說⑦：

郭沫若的《中國古代社會研究》算是近幾年來中國出版界中最時髦，最出風頭的一本著作。郭先生的文學家的筆調，豐麗的敘述及他在全書中流露出來的革命熱情，在在都能使他的著作獲得廣多的讀者和歡迎。

但是，他以為，郭沫若的這部書之所以轟動一時，「全是因為此著作出世之時代關係和他應給了某種社會勢力的待望」⑧。雖然，在李麥麥看來，這麼一部時髦的著作「是用錯誤砌成的」，「其著作的本身並無偌大價值」。李麥麥的批判內容，在此不擬細說；但就與郭沫若立場相敵對的人來看，

郭沫若倡言運用辯證唯物論研究中國思想、社會的發展，或就中國歷史、思想、社會的發展來考驗馬克思主義的適應度，並以《中國古代社會研究》一書為後繼者做了示範表演，實可視為另外一種表達政治意見的方式。

批評郭沫若甚力的李麥麥以為，《中國古代社會研究》之所以轟動一時，「全是因為此著作出世之時代關係和他應給了某種社會勢力的待望」。

也感覺出他這部書的現實意涵，更加突顯出此書在當時文化思想領域內的份量。

與當時中國社會中形形色色的政治言論相較，《中國古代社會研究》的意涵是譬喻性的。在這部書裏，郭沫若並不像陶希聖那樣，直截了當地於決算中國社會後，便宣稱孫中山的理念乃是中國革命依循的基點：自然也不同於國民黨改組派、中共中央或托派人士一般，直接提出政治綱領以為號召。

而郭沫若在《中國古代社會研究》對國史進程之論述，既然符合馬克思主義的論式，因是，國史未來之前途，更應走向馬克思主義對人類未來的規劃：共產主義社會之來臨——即便郭沫若並未明言，但全書的論證，卻起了巧妙的譬喻作用。即如他自己所言，由清算過往的社會，看出對於未來社會的待望。

馬克思主義史學的原型

這樣看來，在1920年代末期，郭沫若開始進行國史發展歷史之研究，其間的轉折固然是費人疑猜的：或許，盤旋在郭沫若心靈深處的胡適陰影，的確是他必欲去之而後快的痛楚，因而激勵着他奮筆直書，一瀉千里似的完成了《中國古代社會研究》，從此揭穿了胡適舊學新知不足道的面目，並為他自己樹立了「真理掌握在我手上」的先知形像：然而郭沫若這部書的假想敵，未必只有胡適一人。忽視社會背景對促成郭沫若轉向古史研究的影響與其象徵的社會意義，恐怕只能做道德領域內的說教。

雖然，郭沫若在《中國古代社會

研究》對國史進程之論述，力圖符合馬克思主義的論式，直接徵引馬、恩的原典做為釋論的起點，對此後中國馬克思主義史學的發展起了導引作用；但因其議論之先出，並及同輩人物對馬克思主義理論別有理解，所以，在此後的「社會史論戰」中，《中國古代社會研究》乃成眾矢之的。批判者非僅對中國歷史／社會的發展階段另做描述，進而批駁郭沫若對馬克思主義之理解的不足／錯誤之處，由此便即指出了他對中國歷史／社會發展階段的錯誤論釋（當然，這些論者也由此而指出了中國前途所在的一條道路）。而從郭沫若廣受批判、非難的現象觀之，事實上也即說明了他的論議已然起了先驅的作用。

是故，對後來在中國馬克思主義史學陣容中嶄露頭角的史家們，如呂振羽、范文瀾、尹達等人而言，郭沫若乃是他們一致推崇的先行者：而就反駁的論者而言，他也應該居於領導的地位。畢竟，不論做甚麼樣的主張，他們的論證模式，其實都是同郭沫若並無二致的：從馬克思主義的觀點出發，佐以對中國古典文獻，考古資料的釋證，從而做出論斷。在他們之間，或許因為對馬克思主義的理論熟悉程度各有不同，或許也因為對所徵引的古典文獻、資料的釋證互有出入，以致產生論斷分歧、議論有別的情勢，但其釋證的模式皆乃同出一轍。

從這個觀點上來看郭沫若的《中國古代社會研究》，可謂是此後中國馬克思主義史學發展的原型。他在理論上的認識，本於馬克思的〈政治經濟學批判·序言〉與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國家的起源》，而其認識不足／錯誤的缺陷，則由以後的同道史

在中國馬克思主義史學陣容中嶄露頭角的史家們，如呂振羽、范文瀾、尹達等人，他們的論證模式，其實都是同郭沫若並無二致的：從馬克思主義的觀點出發，佐以對中國古典文獻，考古資料的釋證，從而做出論斷。

家陸續補充、修正，並且由此來反駁郭沫若的意見或建立自己的體系，但是，「祖述馬恩」卻是他們的共同特徵，郭沫若則首開先端。

一個新的靶子

在「五四」退潮之後，把胡適當成箭靶來打的，意欲與之一爭勝長的作家不知凡幾。類似於李季之《胡適中國哲學史大綱批判》，葉青之《胡適批判》等等論著，在出版市場上都領一代風騷。但在日後的「中國社會史論戰」的砲火裏，郭沫若其人其書才是眾矢之的，這個場域可完全沒有胡適插嘴／生存的空間了——就在郭沫若信筆寫來，抨擊陶希聖《中國封建社會史》一書是「反歷史」的時候，就在「社會史論戰」諸方論者譏嘲郭沫若搞不懂馬克思主義之精蘊，就妄想在《中國古代社會研究》一書為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國家的起源》此書之續篇的時候，他打倒胡適的心願，或許真的成功了：誰不把目光焦點放在他的身上呢？——雖然，他在這兒取代了胡適，成為被人批判的對象，一個新的靶子。

社會背景與時代風潮之轉移，為郭沫若潛入古史研究領域提供了一個很好的機緣：而他也未曾辜負時代給他的機會，在這兒開展了他另一番的生命旅程。儘管，他在這趟行程裏，越走越顯得狼狽：同道的馬克思主義史家，拿馬、恩、列、斯、毛的經典論述批評他硬套公式，逼着他不得不因此而屢以今日之我戰昨日之我，三番兩次修改自己對中國社會歷史分期的看法：而非同道中的學者，更要洞悉促成他志業轉向的心理因素，乃至

於揭穿抄襲他人之著作的劣行。然則在謗譽之外，我們卻看見了一種新的歷史觀因之而萌生勃興，延傳至今，依猶未絕，並已然盤踞着十億人口的歷史心靈。

世事自有於月旦臧否個人德行之外所應言、所當知者。

註釋

- ① 余英時：〈莫道人間總不知——談郭沫若的古史研究〉，《中國時報·人間副刊》（台北），1992年10月21-23日。
- ② 分別參見：遼耀東：〈郭沫若古史研究的心路歷程〉，收入氏著：《史學危機的呼聲》（台北：聯經，1987）；遼耀東：〈郭沫若吻了胡適之後〉，收入氏著：《且做神州袖手人》（台北：允晨，1989）。
- ③ 郭沫若：〈革命春秋〉，《沫若自傳》，第3卷（香港：三聯書店，1978），頁311-12。
- ④⑤⑥ 郭沫若：《郭沫若全集·歷史編》，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頁6；9-10；17-18。
- ⑦⑧ 李麥麥：〈評郭沫若底中國古代社會研究〉，《讀書雜誌》，2卷6期（1932年6月1日），頁1-2。黑體字為引者所強調。

在「五四」退潮之後，把胡適當成箭靶來打的，意欲與之一爭勝長的作家不知凡幾。但在日後的「中國社會史論戰」的砲火裏，郭沫若其人其書取代了胡適，成為一個新的靶子。

潘光哲 1965生於台北。台灣大學歷史系博士班研究生，同校兼任講師。著有《郭沫若與中國馬克思主義史學的起源》、〈陳三立傳〉、〈胡適與羅爾綱〉、〈嚴復論中國國民的改造〉，譯有《英國馬克思主義史學家》。現正從事近代以來中國民主共和理念史，以及關於「改造國民性」論述的研究。